

华中局党校:求真务实办学的典范

陈蓉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 党性教育研究室,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华中局党校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1年5月在苏北盐城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虽几经周折,几度迁址,仍克服困难,坚持办学,直至1944年冬完成历史使命。华中局3年多求真务实办党校的成功实践,在坚持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突出抓好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制度等方面,对于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华中局党校;党校姓党;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D231;K2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4-0006-05

一、华中局党校的创办背景

重视和加强干部培养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开始探索干部教育培养工作。抗战时期,延安抗大式的干部教育取得成功并迅速向各根据地推广,使得党的干部教育经验更加丰富,干部教育理论更加成熟,干部教育体系也更加完善。

1. 抗战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状况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大批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干部队伍损失很大。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军队和地方都亟需大量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条战线上,都深感干部数量的严重不足,毛泽东称之为“干部的恐慌”。

除了干部数量的不足,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也亟待提高。老干部的优势在于政治方向坚定,方向明确,纪律性强,实际斗争经验也较为丰富;但由于他们多数出生在工农家庭,普遍缺乏系统的教育,所以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相对较低。而新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朝气蓬勃,富有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战洪流,但由于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缺乏锻炼,政治方向还不

够坚定,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实际工作经验也比较缺乏,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小资产阶级意识。

2. 抗战时期党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指示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各游击区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有系统地举办党校和训练班”^[1]。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培养和提高干部教育问题作了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争任务。”^{[2]526}指出了培养和提高干部对抗战战争和边区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巨大意义,要求抗日根据地大力举办干部学校,说“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2]769}。

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特别提出了干部的培养与教育的问题,以提高地方干部的能力与威信,独立地领导当地的工作。并要求“大规模的开办各种训练班与抗大职大分校,尽量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很好的爱护他们,培养他

们来参加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反对不注意争取知识分子与不信任非党干部的狭隘倾向”^[3]。

1942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指出:“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他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4]

3. 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干部教育培养的迫切需求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在皖南集中整编后,遵照党中央指示东进北上,初步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局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在皖南遭受了重大损失。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继续领导华中敌后抗战。1941年春,华中局在盐城成立,刘少奇任书记。

新四军各部主要来源是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但是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且长期处于斗争环境,没有专门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相对不足。在军事上,他们对山地游击战实战经验丰富,但关于战略战术方面的军事理论知之甚少。同时,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也使得部分同志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不拘小节的游击习气和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有少数同志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迷茫的情绪。此外,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中一部分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对改编为新四军有排斥心理,还有些北方过来的战士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对于到南方作战心里有抵触情绪,因而,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思想素质都有待提高。

华中地区日、伪、顽几种力量并存,斗争形势尖锐复杂。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既要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又要放手发动基层群众,还要团结争取地方进步士绅。广大民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持观望态度,需要干部去宣传发动;为保证党政军的后勤供应,筹粮筹款工作需要干部去完成;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干部去组织和推动。这就迫切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政策会领导的党政干部来充实基层政权。根据地建立之前,在苏中、苏北等地区虽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但为数很

少。在新四军进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之后,在广泛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才逐步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这些新加入的来自各阶层的同志,对党的知识、党的组织观念和党的作风都缺乏了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所以加强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党的观念和党性修养,就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刘少奇一到华中,就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抓党的建设,特别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力于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积极筹办干部学校。

二、华中局党校的办学特色

1941年春,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相继开学之后,刘少奇即指示彭康(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温仰春(盐阜区党委副书记)等人筹办华中党校。1941年5月23日,华中局党校正式开学,刘少奇兼任校长,彭康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

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是部队团、营级干部,地方县、区干部和部分刚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共三百多人,成立一个总队,傅秋涛任总队长,李雪三任总支书记。下分三个队,一队为县、团以上干部,二队为区、营级干部,三队为知识青年。学校设在盐城登瀛桥西的一个大仓库里,与军部隔河相望。同年7月,由于日伪军“扫荡”,第一期学员提前结业,党校随军部向北转移到阜宁县的汪朱集继续办学。

1941年10月,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在汪朱集开学。学员有三百多人,分两个队,一队为团以上干部队,二队为地方县、区干部队,也有一部分军队干部。学习时间近半年,到1942年三四月份结束。

第三期在1942年五六月份开学,学员三百人左右,分三个队。第一队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地方干部队,其中青年较多,女同志占一半左右;第二队是军队的副团和营级干部队,文化水平较低,还为他们补习文化,人称这个队为文化队;第三队是军队团以上干部队,其中也有一些县委书记。学习至10月底,得知日军又准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向淮南转移,党校第三期的学习也提前结束。校部随军部转移到

淮南盱眙县的新铺镇。

1943 年八九月份,华中局党校举办第四期。这一期学员二百多人,一、二队是机关行政技术人员及部分白区来的干部,三队是县、团以上干部。第四期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和审干,党校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和审干小组领导学习。1944 年冬,华中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任务完成。此时,中国抗战形势亦根本好转,华中解放区的巩固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局党校的基础上筹办华中建设大学,主持党校工作的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任建大校长。

从 1941 年春至 1944 年冬,华中局党校先后举办了四期,培训地方县区干部、部队团营干部及青年知识分子千余人。这三年多的干部培训实践,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育方针等方面,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

1. 办学条件异常艰苦

1941 年前后,敌后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华中形势尤为严峻:日伪军频繁“扫荡”和“清乡”,妄图消灭新四军力量,占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事变后,仍然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妄图把新四军消灭或赶出华中。华中局党校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的。

日伪军频繁“扫荡”,迫使党校经常迁移。每到一处,就要重新选校址、租民房、搭草棚;土堆当讲台,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没有粮食蔬菜,自己开荒种地;没有服装被褥,自己纺纱织布。刘少奇针对华中局党校所面临的现状作出指示:“为了使党校能够适应战争环境办学,党校也要军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枪杆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学习,农村田间是我们的课堂。”^[5] 1941 年 7 月,日军进攻盐城,华中党校即转移到苏北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这里穷乡僻壤,办学条件很差,连一间像样的大教室也难以找到。面对如此困境,刘少奇态度很坚决,他表示:党校一定要办,没有屋基向荒地要,没有砖瓦找芦苇。在他的亲自带领下,干部战士一起动手,临时搭建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草棚。就在这间设施简陋的草棚里,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培训班如期举办。

2. 师资力量较为雄厚

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党校的师资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新四军重建军部和华中局在盐城成立后,盐城不仅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

中心,同时也成为华中的文化教育中心。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奔赴盐城投身文化抗战,因此华中党校也得以拥有一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亦很丰富的教师队伍。1941 年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化名柳岗,奉调苏北,执教于中共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革命史。同年 7 月,孙冶方化名宋亮来到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主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除了这些业务精深的专职教员,刘少奇、饶漱石、曾山、彭康等华中局领导人也经常到党校为学员讲课,成为党校的兼职教员。刘少奇在盐城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亲自抓华中党校的教学工作。他经常在夜里把彭康、傅秋涛等人找去,听他们汇报学员讨论情况,依据这些情况认真备课。华中局党校第一期开学,刘少奇专门抽出四天时间,为学员作了《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专题报告。第二期开学,刘少奇打起背包,七次住进党校讲课。第一次一天,讲了《人为什么犯错误》;第二次六天,讲了《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和《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第三次七天,专门讲《哲学的范畴》和《辩证法唯物论》;第四次四天,讲了《党的战略与策略》和《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第五次三天,讲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第六次一天,讲了《1941 年形势和 1942 年任务》;第七次两天,讲了《怎样进行党内思想斗争》。^[6]

3. 重视马列主义教育

华中局党校学员多为新四军团以上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县区干部,他们长期处于游击斗争环境,几乎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因此理论基础不深,也不太懂得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华中局党校把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作为办学的重要任务,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程,把《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著作作为必读书籍开列给学员阅读。刘少奇在华中党校讲课,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专门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

1941 年 7 月,孙冶方(化名宋亮)在编写《马列主义原理》教科书过程中,写到《方法与理论》一章时,对有些同志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问题没有把握,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

请示信。刘少奇在复信《答宋亮同志》中,阐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实践的重大意义。刘少奇肯定了宋亮的建议,强调指出:只有在全党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才能保证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

4.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华中局党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刘少奇强调在党校教学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 with 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7]他深刻指出党校在教学中既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又要密切联系当前的斗争实践,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就为办好党校指明了正确方向。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华中局党校紧密联系斗争实践,引导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第三、四期,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政策外,整风也成为学习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第四期,基本上以整风学习为主。许多干部经过党校整风、审干,既弄清了问题,放下了包袱,又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

三、华中局党校的办学实践对新时代党校工作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华中局党校的创办全面提升了党政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素养,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大大加强了华中干部队伍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同时,华中局党校的办学实践,给新时代党校工作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参考。

1. 发挥党委办党校的主体职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思想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党仍然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941年5月华中局成立后,作为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即着手筹办华中局党校。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华中局党校第一期培训班于5月23日正式开学。党校迁到阜宁汪朱集后,刘少奇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在荒地上搭建起一座“草棚党校”,他亲自住在党校备课授课。这些办学实践体现出华中局领导对党校工作的高度重视。

重视发挥党校作用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

优势。进入新时代,各级党委应该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第八条明确指出:“各级党委是办党校(行政学院)、管党校(行政学院)、建党校(行政学院)的主体,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应当加强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党校姓党”原则,把办好党校管好党校建好党校作为自身重要的政治使命,把握方向、统筹协调、化解困难,全面助推党校高质量发展。

2. 落实主业主课的重要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工作的重心必须是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干部到党校学习,主要任务是学习党的理论、接受党性教育。领导干部干好工作,需要掌握各方面知识和技能,也应该有丰富多彩的爱好和兴趣,我也就此对领导干部提出过要求。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党校的主要任务,有很多途径可以解决。如果党校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这个主业主课放松了、甚至荒废了,搞了很多其他方面知识、技能、兴趣的东西,那就会喧宾夺主,甚至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8]

党校是党员干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各级党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教学工作的要求,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放在主业主课的位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在各级党校的教学安排中,确保这两类课程的教学课时占到总课时的70%以上。

3. 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风,也是党校教学的根本原则。到党校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都具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带着许多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党校学习,希望在学习中得到理论上的解释和论证。此外,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和我国各方面改革进程的深化,大量复杂的新问题使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然经历一个再学习、再实践、再认识、再提高的过程。这就要求党校教学既要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要结合学员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分

析;既要准确解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又要深入阐释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8] 各级党校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当前的形势,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学,紧密联系学员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开展教学,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4. 强化领导干部上台讲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2 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说:“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这样的‘不一般’对党校师资的要求也不一般,党校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也应该不一般。”^[8] 他强调:“在党校所有财富中,教师和其

他各类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党校所有资源中,优秀教师和优秀人才是最急需的资源。”^[8]

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各级党校应予以高度重视。一方面,通过基层调研、挂职锻炼等方式,让中青年教師加深对地区经济社会工作实际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选聘行业专家为兼职教师,充实党校师资力量。此外,还要把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的好传统发扬光大。领导干部是干部中的骨干和优秀分子,他们在政策把握、视野思路、问题导向、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建立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制度,可以优化党校师资队伍结构,有效弥补党校师资存在的不足,不断提高党校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必须把这个好传统机制化、常态化,使之焕发新的光彩。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的规定,要确保领导干部到党校授课的课时占主体班次总课时比例达到 20% 以上。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301.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1)[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91.
- [4] 邓力群. 回忆延安整风[J]. 党的文献,1992(2):14-16.
- [5] 温仰春. 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474-475.
- [6] 曹晋杰. 刘少奇与华中党校[J]. 铁军·纵横,2017(9):28.
- [7]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8-220
- [8]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J]. 求是,2016(9):7.

Central China Bureau Party School: A Model of Running a School Pragmatically and Truth-seekingly

CHEN Rong

(Party School of Yanche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Central China Bureau Party School is a cadre school founded in Yancheng, northern Jiangsu, in May 1941. Even under the arduous anti-war environment, its founder overca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and insisted on running the school, which then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adres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Three years of successful practice of running the school reflects the spirit of pragmatic and truth-seeking, which is of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work of party school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Central China Bureau Party School; Party School's Identity;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责任编辑:陆 勇)